

隱身了，難道這就等於永遠不會重現嗎？難道幽靈不能穿着更加迷人的時代服裝在適當的時地「顯聖」嗎？

海灣危機 當世人以為這個世紀經歷了數不盡的熱戰和冷戰，會平穩地把這個星球送入二十一世紀時，忽然爆發了海灣危機。

很有可能這場危機被人類的理智所化解。果如是，二十一世紀將得到啟示，人的社會還是理智佔上風；萬一危機沒能化解，戰火最終燒起來，歷史能否證明：芥子毒氣，巡航導彈最終還將讓位給理智與理性？難道二十一世紀的人類還不能比過去二十個世紀的祖先們更聰明些？

信息革命 二十一世紀從本世紀老人手中接過來的，卻是「信息革命」這個無價之寶。信息本來與能源、物質同在，但它沒有被世人發現，利用與開發，只是到了本世紀60年代才忽然登上世界的寶座。信息革命，或新技術革命，或第三次第四次「浪潮」，正在跨越世界性的和地區性的社會動亂向前邁進。難道世人還沒有確信，這場科學技術革命的深化將會改變人類的社會生活，改變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難道可以懷疑這深化的革命將在二十一世紀，衝破意識形態的對立，有成效地遏制和減少（雖則我們還不能過於樂觀說它最終地消滅）困擾人類幾千年的貧困、飢餓、愚昧狀態，進而打碎奴役和壓迫的機器麼？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社會難道會同過去長時期那樣滿足於奴役與自由並存、進步與愚盲共在的不平狀態麼？是不是可以預見，未來的一百年，將會是結束人類「野蠻」歷史的起點？在世紀交替之際，世人是不是將帶着希望進入新的紀元？

陳原

中國社會科學院應用語言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待從頭， 收拾舊山河

余英時

在1000年的前一兩年，歐洲正處於基督教思想深入人心的時期，那時歐洲人心惶惶，都以為世界末日將至，因為當時盛傳1000年是「最後審判」的日子。現在2000年離我們只有10年了，許多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卻都對二十一世紀的降臨抱着無限的憧憬和期待。這一對照是十分有趣的。

最近幾年我們常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樣的自我恭維之辭。這句話的來源大概是60年代湯因比（Arnold Toynbee）和日本思想家的對話。那時西方的危機重重，湯因比因此對亞洲文化有所嚮往，自是人情之常。但時至今日，亞洲只有一個日本在經濟上贏得了「世界第一」的稱號。中國則由於真相畢現而使湯因比的預言徹底破產了。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不大可能有光輝前景，因為中國人自己在二十世紀造下的罪孽太深重了。從一部中國史來看，二十世紀是最混亂、最黑暗的時代。無論是「五胡亂華」、「五代十國」或「蒙古入主」較之二十世紀的中國都是微不足道的。上述幾個中國史上的「黑暗」和「混亂」時期不過是一時外患造成的，並沒有傷及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根本。所以接着還有唐、宋、明的文化新生。二十世紀中國則是一連串而且步步升級的「革命」；這是中國人自己爲了「破舊立新」所作的努力。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不但在觀念上是由知識分子提供的，而且最初的發動者也往往是知識分子。但「革命」的結果則是中國社會的邊緣人物（如地痞、流氓、光棍、無賴、不第秀才之流）佔據了中心的地位、支配着中國的命運，而原來在社會上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則反而邊緣化了（「邊緣化」用大陸上流行的話說，便是「靠邊站」）。知識分子的相對邊緣化本是現代多元社會的普遍現象，不僅中國爲然。但中國的情況則十分特殊：邊緣人物形成了一個變相世襲的「新階級」（吉拉斯說）；邊緣人「新階級」不但不代表任何社會階層（士、農、工、商）的利益，而且和所有階層的利益都是處於完全相反的地位。知識分子所持徹底「革命」的理論使邊緣分子得以輕而易舉地摧毀了一切傳統的社會和文化組織和人倫關係，代之而起的則是一個絕對宰制性的單一政治組織，從中央一直貫穿到每一個家庭，甚至個人。在所有現代化的社會中，傳統的組織和關係都經過了程度不同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必須通過一個自然發展的歷程，而不能採用揠苗助長的方式。中國邊緣人的「新階級」出於「奪權」和「保權」的動機則更有甚於「揠苗助長」者，他們竟用暴力把中國舊有的民間組織一掃而光。這就斷絕了整個民族的生機，使現代「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的成長成爲永不可能的事了。

今天，邊緣人的「新統治階級」雖已隨着絕對權力的絕對腐蝕而呈現土崩瓦解之象，但已被徹底摧毀的傳統組織和關係卻已無從恢復舊觀。二十一世紀中國所面臨的最大課題便是怎樣在二十世紀的廢墟上重建民間社會，使一個比較合理的新秩序得以逐漸實現。這是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最嚴重的挑戰，我們簡直不能想像這一重建的工作將從何處着手。現在東歐已開始嘗到了這一劑苦藥，但較之中國仍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東歐的「新階級」主要是由外力強加而來

的，民間社會的傳統（如宗教）並沒有完全消失。

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知識分子贖罪的世紀。儘管他們已處在邊緣的地位，他們在思想上的徹底反省仍然是收拾中國破碎山河的一個始點。如果他們繼續堅持中國的問題是由於「封建傳統」還沒有破壞乾淨，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人便只好準備接受「最後的審判」了。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這是二十一世紀給中國人所規定的歷史任務。

余英時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講座教授

民族國家觀念的反思

陳其南

國家的組成和形態目前仍然是這個世界最主要和最高層次的政治生活方式，也是近代世界歷史發展的主題所在。不論是民族國家主義的興起，國家單位之間的戰爭與和平，或是國際關係和組織形式的拓展，都是以「國家」的基本形式作為出發點而展開。對於大部分第三世界的部落民族或歷史悠久的傳統國家而言，這些源於近代西方的新而複雜的政治態勢往往有適應上的困難，一方面要對應外在世界秩序日新月異的壓力，一方面又要調整內部新舊架構和意識之間的落差，因此第三世界國家政治體制的緊張與扭曲幾乎不可避免。近代史上中國的國家形態與社會體制也多在這種內外夾擊調適不良的情況下屢屢出現矛盾與動亂。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形態在組成的形式上目前仍未達到穩定的階段。首先是海峽兩岸依舊存在着無可否認的兩個國家政治實體，各自的治權皆不及於對方，但雙方政權又都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形式。另一方面，香港已確定在